

# 现代化论与依附论

## ——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

陈明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上海 200433)

作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两种影响广泛的理论,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围绕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问题展开全面竞争的反映, 也是科学技术革命兴起时代新世界史观试图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纳入其学术框架进行比较思考的结果。<sup>①</sup>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以进化论社会学为方法, “修正”的现代化理论虽肯定多元的现代性及其发展道路, 但未脱这种方法论特征, 都主要是从时间上(历史演进与趋同)对世界交往中的各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给出的一套发展学说和战略论证。依附理论则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基础, 侧重从结构上(中心-边缘/外围关系)对世界体系中的各国为何未能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系统分析和批判, 其中激进的依附论认为现存结构需进行彻底变革, 温和的依附论主张利用结构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两种理论都对20世纪各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危机与革命、工业化、社会运动和民主化运动, 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科建设特别是比较政治研究提出过极其重要的建议。它们体系浩大、谱系绵长、论域广阔、流派众多、各执一端又不无交集, 一些结论被证明, 一些结论被证否, 都有自己的洞见和局限。虽然在今天两种理论已不再具有当年学术上的宰制地位, 但其理论阐述对我们理解现存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 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 一、现代化论与依附论共同关注的问题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都是从世界体系着眼的理论。现代化理论发轫于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的现代性因素, 最早通过新航路的开辟、殖民和贸易, 而后通过战争和资本强制扩展到全世界。这种现代性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世俗化, 被认为代表着普遍性的潮流, 它所到之处, 摧毁了“传统”的藩篱, 新建了“现代”的秩序, 伴随着技术、观念和制度的传播, 把彼此隔阂的世界变成一个现代的、有机的、整体的文明世界。在经验上, 它是地理大发现引起商业革命、价格革命连锁反应的结果; 在路径上, 它是资本沿着“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走向全球的冒险旅程, 由此在结构上便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合理化的世界体系。

<sup>①</sup> 现代化理论一般被认为是源于马克斯·韦伯对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 经由帕森斯继承、改造和引入美国学界并伴随着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扩张战略而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宏观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讨论的工业化、城市化等问题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课题研究, 形成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理论。在中国, 这些问题其实在20世纪20—40年代就有了广泛讨论, 许多讨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以工立国”(“产业化”)等概念与观点, 那时作为宏观社会理论的现代化理论还未系统成型。(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另一个理论——依附理论, 其理论源自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帝国主义、殖民地与民族革命的一系列著述, 这些理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推动世界进步的战略基础, 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间地带”革命论。它们实际上构成了50年代后西方人提出的“第三世界”与“中心-外围”依附结构的先声。因此,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成规模地传入中国, 但在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中并不陌生。

在这方面，依附理论并没有比现代化理论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依附理论同样承认这是一个由扩张性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造就的完整的工业分工体系，但较之现代化理论的进化论的社会学倾向，它更强调这个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特质，即在资本与市场的运动中，后发国家并不必然能够把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家发展的竞争优势；恰恰相反，国际分工结构事实上堵塞了后发国家的发展之路，以致于这些国家越来越难以出现现代化理论所许诺的假以时日必见成效的现代化前景。现代化的后面是资本的扩张和资本对世界的建构。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也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是通过强调分化与整合的交替作用而实现的，结构分化表明系统的复杂性和适应性程度在增加，整合则在分化的结构之间建立新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提高整个系统的适应能力。这个过程被视为通过时间表现出来的进步过程。现代化理论解释西欧国家之所以最早进入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最先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但把后发国家未能实现社会结构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其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阻碍作用，却不免有同语反复之嫌。现代化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实际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分析方法，而是一种建立在对时间信仰（进化论）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哲学观。依附理论关于发展的观点，其重点在于颠覆这种哲学观，它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逆向发展”理论，即以发达国家的发展为背景来揭示不发达国家日益落入发展困境的经济政治缘由。“低发展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成为它的中心概念。<sup>[1]</sup> 这些概念的意涵主要体现为三点：1）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发达国家即使有程度不同的经济增长，也难有合乎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2）发达国家过去虽然也是从“不发达”经济演变过来的，但从来不是从“欠发达”经济演变过来的，换言之，发达国家有过“不发达”（undeveloped）的历史，但从来不曾有过“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历史；3）“欠发达”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扩张的结果，是国际分工作用于第三世界的产物。第三世界不是因为时间在时间上较发达国家起步晚才“显得”贫穷，而是因为在空间上和发达国家发生历史关联才“落入”贫穷。<sup>[2]</sup><sup>146</sup> 正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Stavrianos L S.）指出，从根本上说，“欠发达”这个词表明，不是西方“发现了”第三世界，而是西方“制造了”第三世界。<sup>[3]</sup><sup>17</sup> 不发达国家的困难和失败，是世界分裂为“中心国家”和“边陲国家”的不平等结构的结果。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都十分重视通过类型的比较来建立自己的言说范式。现代化理论最典型的比较范式是“传统-现代”，它从时间维度把人类的行为方式纳入“农耕礼俗”和“工业法治”的二分类型，强调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是一个必然的普遍的进程。在这个范式中，传统被认为是一个需要与之决裂或进行改造的经济、政治、社会和观念体系，借由商业、市场和科学的力量走向现代民主和法治。它为人诟病的是隐含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如列维的“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对立<sup>[4]</sup><sup>134-144</sup>，但它关于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从身份到契约、从专制到民主、从神圣化到世俗化、从闭关锁国到开放疆域等的讨论都具有巨大的知识含量和理论价值，相当广泛地被运用于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研究之中。<sup>①</sup> 而依附理论最著名的比较范式是“中心-边陲”，它从结构上批判现代化理论的时间政治学，认为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展已经把世界变成了中心与边陲两个区域，中心代表着自主与富裕，边陲代表着依附与贫穷，中心可以发展或超常发展，边陲不可以发展或只

<sup>①</sup> 如李普塞特的《政治人》、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等，都具有浓厚的现代化理论色彩，当然其中一些著述对现代化论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有受制于中心的依附性发展。<sup>[2]152-158</sup>两个区域并非没有联系,国际分工中的资本和市场是它们的联结纽带。它们的关系是:中心的繁荣和发展是边陲凋敝和贫困的根源,边陲的凋敝和贫困是中心繁荣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最激进的依附论提出“脱钩战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国家的政权性质),斩断与中心的联系,以谋求自主性的发展<sup>[5]297,298[6]14,17</sup>;而温和的依附论则主张利用国家权力和外交政策,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融合(改造外围资本主义),在国际分工中最大限度减少结构的强制,通过干预和利用依附性的发展来逐步克服依附关系。<sup>[7]277</sup>

## 二、现代化论与依附论分歧的焦点

由上可见,就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战略而言,这两种理论的焦点集中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非西方国家能否实现自主性发展,如何实现自主性发展?现代化理论的答案是肯定的,前提是变革自身的制度与文化;依附理论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因为国际结构不提供内部发展空间。于是,这两种理论的问题便又集中到一点,即非西方国家自主性发展的动力和障碍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前者倾向于从内部来寻求解决之道,后者强调从外部来理解成败之因。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思想来源中,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列宁都是不能忽视的流脉,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马克思)构成了一种新世界史观<sup>①</sup>。从这种观点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整体世界而单独生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国际环境而孤立发展。由此可以推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条件,还取决于国家所处的外部条件。因此,单纯坚持现代化理论的“内因决定论”或依附理论的“外因决定论”都是偏颇的,它们各自都需要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以形成新的综合。

其一,这种世界史观承认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一个必然进步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肩负着双重使命,即破坏的使命和建设的使命<sup>[8]857</sup>,前者瓦解村落的、封建的、封闭的制度和秩序,后者促成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sup>[8]402</sup>。非西方国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其国家主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社会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其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蚀,内部结构经历了严酷的分化,表现出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的确不是为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福祉,而是为了占据贸易优势、扩大海外市场和攫取垄断利润,在这方面,依附理论看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然而,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8]854</sup>。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呼应了世界史的逻辑。

其二,非西方国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就能实现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一方面可以通过和本土传统权势集团的结盟来进行,在满足国际资本对国内剩余盘剥的过程中,传统权势集团成为利用和依附国际资本而自肥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也成为国际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买办工具,导致这些国家所谓“现代部门”和“传统

<sup>①</sup> 世界史是指把世界理解为整体世界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不是各国历史相加组合的国别史(history of all countries)。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韦伯都是世界史观念的阐述者和倡导者,分歧只是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源自“绝对精神”或“(新教)伦理”,还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撇开这些不论,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过程,指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日益密切联系为一个整体,进而揭示地域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的必然进程,至今仍是有关世界史的主流观点。

部门”的二元分裂；另一方面，即使在“现代部门”，现代化的理念、技术和管理以及民主、人权要求也可能被传统权势集团抵制，他们希望维持国内的二元结构，希望和国际资本分享剩余，反对、拒绝与国际资本联袂而至的“现代性”，因而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阻碍力量。依附理论比较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依附理论也遇到了自己的理论矛盾——依附理论在强调非西方国家不能发展的外部约束时，似乎没有看到，国际资本导致的国内“现代化困局”恰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反现代化的权势集团及其制度，因而这些国家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取决于能否成功剪除这个集团，改变这种制度。因此，不无矛盾的是，在意识形态上“亲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由于把后发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阻碍作用，反而支持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必须发动社会变革或革命的理论 and 历史逻辑。

其三，如果说在国际分工和经济日益国际化的时代，后发国家已经不可能回到封闭的状态，那么开放是否一定意味着依附？的确，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会呈现出某种依附，依附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程度不同的不发达，这是依附论问题意识的来源。然而，依附并非不可克服，克服的必要条件是政治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温和依附论者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根据历史结构主义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不同的边陲国家会因为利益集团、政治权力和阶级状况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依附状态，边陲国家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政治结盟、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回应依附的环境。这种由阶级、政党和军人组成的联盟及其战略构成的历史活动可以影响依附的结构（如巴西），从而创造出一种“联结依附的发展”模式（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sup>[9]160[10]xxi</sup> 卡多索在这里虽然承认依附结构仍然是决定性的，但已意识到面对结构强制，历史主体有意识的互动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向前推进，即依附和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不是固定的，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国际分工不利的条件下，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先赢得依附性的发展，经过发展的累积效应，最终摆脱依附，过渡到自主发展。

这种政治上的主动是什么意思？在许多论者那里，是指主权独立、政权统一、阶级联盟、社会动员、战略实施等要件。主权独立、政权统一可以增强国家在一系列事关地缘政治、国际贸易、联合开发、产品定价的谈判中的地位，国内阶级联盟、社会动员、政治变革以及各阶级行动对外部势力的影响则可支持和提升国家的管制能力、生产能力、分配能力，使之在同国际资本抗争、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国有化、制定产业政策等战略中占据优势，从而提升 GNP（国民生产总值）在区域经济或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正是温和依附论（依附性发展论）者的观点，他们并不主张脱钩，而是在结构中看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说，看到通过内部政治结构的变革调整改变外部政治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可能。这也是依附理论分析方法转向成熟的标志。<sup>[11]119</sup> 不难看出，这种内部政治结构的变革实际上属于（现代）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范畴。现代国家建设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现代化论中作为发展政治学预定目标——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依附论在这里给边陲国家开出的拯救药方竟然颇具现代化论色彩，看似讽刺，实则自然。我们知道，依附理论的不发达分析是反现代化理论的，它的若干建议，有的因政策激进不可行而被束之高阁（如脱钩论），有的则因吸收了其他理论要素（如现代化论中的国家自主性）而加强了自身的说服力。这反映了在处理依附与发展、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时，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并非不可调和。事实上，在不少发展理论研究中，依附理论甚至成为现代化修正理论的一个反思性分支而被纳入现代化理论研究体系。

### 三、中国：在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之间

中国自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以后，在世界历史与结构的经纬上便兼具双重身份特征：一是作为变革传统而走向现代文明的“后发国家”；一是作为与中心抗衡而试图摆脱依附的“边陲国家”。关于前者，主流的文献曾将此描述为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相结合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观点被视为“冲击-回应”论而广受批评，它主要的问题被认为是割裂了两种文明的整体联系，低估了中国内部对于现代化的主动性和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是一个站在西方立场观察中国的分析框架。<sup>①</sup>然而，如果注意到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当时士人的惊世之语，也是古老帝国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心理体验，注意到此后的中国不得不放下身段“睁眼看世界”进入“自强图存”的赛道，那么“冲击-回应”模式确实揭示了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中国被“卷入”其中的那一历史时刻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信息。承认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承认中国“王朝循环”的逻辑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中断，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这个“大变局”只有被动消极适应而无自主选择积极动员的可能。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现代化之于中国，主题就是救亡运动。中国人曾相信“师夷长技以制夷”，及至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才意识到“中学为体”的旧体制无法容纳和支持“新式工业”的运用，于是幡然醒悟“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sup>②</sup>，开始了向西方体制学习的改良主义的变法立宪。维新运动失败后，现代化的先行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革命（种姓革命），深信不推翻满清帝制，无以缔造现代化的新中华，如孙中山、章炳麟；一派主张改造国民，鼓吹“新民运动”，认为只有现代化的新国民才能承载现代化的新文明，如梁启超。这个过程一般被看作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观念层次的深化和升华，其间充满着比较、辨析、折衷、突破、冒险、退出、重启等曲折反复的冲突选择案例，是在世界史的背景下以中国为本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为主线的演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回应”的方式和节奏是从中国社会深层矛盾的冲突中生发出来的，“冲击-回应”分析模式并不会弱化对中国在现代化大潮中的主体地位的把握。

比如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问题。西欧的现代化运动所体现的从分散的历史走向整合的历史表明，只有打破封建主义，建立统一的关税、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政府，才能完成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使命。它的政治含义是把权力集中到作为商业阶级的市民阶级手里，其标志是垄断暴力、划定疆域、确立国民身份和民族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正是凭借民族国家的政治外壳，殖民、市场和资本才能所向披靡走向世界。在中国人和西方人正式接触的19世纪，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经存续两千多年，为什么在“新多国时代”的交往中，中国“国家”在西方列强的进逼下节节溃败？这实际上启发了中国人对“国家”的重新思考。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中国要强大，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类似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sup>③</sup>，这可以看作“冲击-回应”的西方观察立场的反映。然而，中国人很快发现，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的行

<sup>①</sup> 参见林同奇为翻译柯文著作所撰写的《“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一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费正清和列文森模式的批评。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7页。

<sup>②</sup> 毛泽东对当时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先进的中国人的描述，详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0页。

<sup>③</sup> 在20世纪初，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变革者都把帝国主义看作“民族之力充沛于内不得不溢于外”的一种现象，甚至把帝国主义看成“民族主义的最后阶段”。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动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食物链下端的殖民地。要改变这种态势，就需要根本改造中国的政治生态，于是，“重建中央集权”就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大主题，在“五四运动”之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剪除与西方在华利益相勾连的地方的、分裂的、反动的、寄生的势力，包括传统的土地权势集团和新生的买办集团（“反封建”）；第二层含义是建立现代的、主权的、民主的国家权力机构，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以刷新的西方话语反对西方列强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帝反封建”之下，一种根深蒂固的时隐时现的信念始终顽强地萦绕在中国现代化推动者的心间：世界历史普遍地植根于文明之中，在中国，这个文明被表述为“天下主义”。面临外部“冲击”，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并没有亦步亦趋恪守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议题和议程，其“回应”具有明显的中国立场、中国方式和中国特色。

如前所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学习和借鉴，而且作为一个边陲国家在竞逐富强中抗争和融入，前者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自主国家。对于西欧民族国家来说，现代性和自主性大体是联袂而至的。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变革（市民社会 VS 专制政治），还是蒂利式的军事财政的运用（强制资本化 VS 封建化邦国），近代西欧所发生的领土划定、主权确立、国民认同的民族国家建构体现了人类理性选择和自由意志，现代的（工业化+理性化）就是自主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内部的（市场资本+代议民主）就是外部的（军事征服+殖民扩张）。但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性和自主性的建构在时间上是不同步的，在结构上是不平衡的。印度在西方政治学的教义中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国家，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其社会结构的种姓制度能够支撑起国家的自主性。<sup>①</sup> 拉美许多国家在19世纪前期获得独立，建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要件，按现代化理论的标准，堪称“现代国家”，但在依附理论看来，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地位（严重缺乏国家自主性）。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眼中，第三世界在达到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明”标准以前，是不配享有主权的，而且被排斥在国际法的国家体系之外。它们被卷入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化潮流中，只能意味着遭受西方列强的征服与殖民化。中国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中国现代性的成长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经受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文化困境）；二是西式民主制度对传统制度的冲击（政治困境），表现在国际关系上，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对中国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统治要求（主权困境）。<sup>②</sup> 现代性和自主性相统一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理性化、中央集权、人民民主、国家能力、国家治理等一系列主题都是现代化的内容。如何能够在卷入全球性国家体系时抵御列强的征服，拒绝诸如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割让土地等殖民化的要求？如何能够在国内危机深重时启动社会改造，打倒拥兵自重的军阀割据势力、反对土地改革的豪绅阶层、腐败无能的官僚政治？如何能够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始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转型、在不平等交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实现边陲对中心的追赶、在人均资源匮乏而人口规模超大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的治理？与许多亚洲、非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把以上这些要求有机统摄起来的方案，是属于共产主义革

<sup>①</sup> 尼赫鲁引述别人对印度的说法：“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的条件下，印度终究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他同意和赞许把种姓制看作印度文明内容之一的观点。参见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15页。

<sup>②</sup> 在这一点上，西方民族国家的实质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与殖民扩张并无实质差异，所以有贝利的说法：“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均属于同一现象”。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页。

命谱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和制度安排。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这种依托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文明，又基于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产生的深刻的反叛运动，体现了对现代性的继承和批判的双重维度。对从19世纪中叶以来即挣扎于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夹击中的后发国家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前途的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现代化理论从时间上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先到者”和“后来者”，先到者用300余年时间实现了现代化，后来者却始终辗转往复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中国所处的“历史时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允许亦耗不起这个时间的风吹雨打。在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时代，中国力图以比早发国家更短的时间来完成新国家的制度建构，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更积极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在赶超的赛道上做成这些事情。依附理论在结构上揭示“中心国家”和“边陲国家”的结构强制，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来控制边陲国家，中国文明的集体记忆显然也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在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中，中国谋求以比中心国家更具动员性的战略来调动现代化的资源，以更有效的产业政策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以更灵活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在对外开放中融入全球化又不致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作为一种有过辉煌过去的理论，现代化论和依附论亦难逃这种宿命。不过，虽然它们存在许多为人诟病之处，自身也一直面临许多挑战，但只要剔除其西方中心论和线性发展观的倾向（现代化论），扬弃其激进脱钩论的某些假设和政策建议（依附论），站在中国的立场，把中国看作既受制于现代世界发展又对现代世界变革产生深刻影响的一部分，那么，它们那种恢弘的世界历史结构视野、强烈的人类进步主义取向和关注过的重大社会政治改造主题，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身处的全球历史方位及其行动逻辑，仍然是富有启示意义和分析价值的。

#### [参考文献]

- [1] 陈明明：《“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关于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概念的一个讨论》，《复旦政治学评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辑。
- [2]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欠发达的发展》，查尔斯·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3]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 [4] 列维：《相对非工业化社会对高度工业化社会结构弱点的某些根源》，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 [5]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 [6]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7]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9] Cardoso F H. 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Stepan A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0] Cardoso F H, Faletto E.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11]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王学礼]

###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rn Country**

ZHOU Guang-hui, et al. (5)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human history, China is undergo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roa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great practice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modernization, which objectively puts forward a major theoretical topic for Chinese academia. It is necessary for scholars to confront the “Chinese phenomenon” that occurs in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and to conduct theoretical and chemical explanations, extracting logically consistent and original symbolic concep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theoretical identity for the “Chinese phenomenon”. On April 23, 2023, the innovation team of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of Jilin University held a small academic seminar with the theme of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The five written articles in this issue we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eeches made by the five schola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four of which were articles on academic thinking abou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rn country, 1 article is a reflection on modernization theory. I hope these articles can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this issue and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constructing a highly contemporary, world oriented, and future oriented narrativ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ory.

Explanati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oad to Building a New Modern Stat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rn Count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Modernized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The Dynamic Balance of Centralization and Vitality: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in China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Dependency Theory: A Rereading of Two Old Development Theories

### **Why and How Is the Labor Code Possible?**

LOU Yu (35)

**Abstract:** The systematic code is the most advanced legislative form and should become the goal of the labor code. Labor law is a legal field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division of labor has brought many homogeneous labor relations, which has built a social foundation for large-scale labor legislation.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lso brought new types of labor relations represented by platform employment and remote work.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from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labor legislation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seeking 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as well as between “labor capital autonomy” and “other governance” of public power. This value concept determin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codes and makes it possible to adopt a moderate system-based code model. Taking historical logic as a guide, China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labor private law relations based on private autonomy and labor public law relation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s in theoretical logic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norms with their respective complete value concept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ctical logic, they should be separately incorporated into labor legal norms belonging to public and private legal departments. The new form of employment is difficult to enter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so it can be independently formed into a “small labor code” in addition to the “big labor code” that regulates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Keywords:** Labor Law; Labor Code; value concept; moderate systematic model; platform employment

### **Normative Composition and Chapter Structure of Labor Code in the Digital Age**

WANG Tian-yu (51)

**Abstract:** The goals of labor codes have undergone iterations of basic labor law and codific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labor patterns driven by technology, the labor code must integrate the existing legislative resources while constructing a normative system and chapter structur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hange of labor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legal abstraction level as the creation of individual labor under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 in addition to the group labor of unitary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labor is not a subsidiary of group labor, nor is it an object to be transformed into group labor. The labor code should take the act of labor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in terms of chapter structure, the existing labor legislatio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group labor,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de, while digital flexible employment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individual labor, and be designed as a separate part of the cod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to accommodate